

远去的 都市



1950年代的上海

A City Displayed
Shanghai in the
1950s

张济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远去的 都市

1950年代的上海

张济顺 著

A City Displayed
Shanghai in the
1950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 张济顺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4

（近世中国）

ISBN 978-7-5097-6635-4

I. ①远… II. ①张…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1950
IV. ①K29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7099号

·近世中国·
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著 者 / 张济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09千字

版 次 /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635-4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从着手 1950 年代的上海研究到今天成书付梓，得到的鼓励与支持难以数计。就最近三年的写作过程而言，是诸多学界同仁、朋友、学生以及学术机构真诚而又慷慨的帮助，才使我摆脱多年不能专注学业的生疏与困钝，渐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虽然难以平复的内心让我词不达意，但还是要向热情相助的各位送上深深的感激之情。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是我的学术家园。中心每办一次研讨会、研修班，每出一期刊物，都为我提供了学习的良机和“试水”的舞台；中心每一个成员投注的心血和努力，让我充分感受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勃勃生机，增添了不断求索的勇气和动力。作为一个研究者，有什么比身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共同体更幸运、更享受的事呢！在这里，我要向中心的各位，特别是杨奎松、韩钢、冯筱才三位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许纪霖、姜进、沈志华、刘昶教授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或提供帮助，他们的学术见地常常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让我心谢不已的是美国及日本的几位知名学者：裴宜理、叶文心、柯伟林、萧凤霞（Helen F. Siu）、小浜正子、久保亨以及石川祯浩。他们深厚的功力和宽广的视野是我学习的楷模，许多灼见与洞察力使我深受启迪。我们分别策划并实施了 1950 年代中国研究、都市研究与上海研究的多个合作交流项目，长时间的讨论切磋，分享研究心得，这些都让我倍觉愉快，乐趣无穷。

年轻学者和博士生是我极好的助手和朋友，他们不但分担了写作过程中许多不可或缺的琐事，而且让我充分享受教学相长的兴奋与快乐。阮清华、刘建平、刘彦文、田蕊、张牛美以及刘亚娟——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中国当代

史研究的强劲后续，充分领略到“后生可畏”，深知要当好“老师”，必须精益求精，不断进取。

我还要感谢贺祥（Joshua Hill）博士，他不但出色地将我的论文译成英文，得以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而且对相关的本书章节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

2011年我“转岗”回到学术领域之后，有幸作为合作研究教授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得以在非常优越的学术环境中，潜心研究与写作，书稿的大部分在那里完成。2013年初又获机会重访阔别了近20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感悟。

本书的部分章节分别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日本）中央大学、一桥大学、筑波大学、东洋文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发表，得到同行们的点评与启发。这里尤其要致谢的是熊月之、章清、周武、刘家峰、陈兼、高纲博文、李廷江、深町英夫、坂垣弘子、山本真和齐慕石（Timothy Cheek）。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美国圣公会档案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档案特藏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档案馆等机构提供了查阅的便利与周到的服务。邢建榕、马小鹤、南希（Hearst Nancy）、程洪、何剑叶、吴君玉以及朱小怡给予的帮助尤多。

多位好友与热心人士接受了口述史访谈。他们是：陈绛、陈力仪、承宪武、狄宗信、黄纯颖、卢廷璋、倪康、李逊、李乃坤、刘禾、王世靖、易荣、严凤霞、姚季梅、郑如桂、朱照宏。网友芒眼（吉明）提供了许多口述线索并应允采用他收藏的黄氏家族照片。

我还要对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道一声谢谢。感谢童世骏书记及俞立中、陈群两位校长给予的鼎力相助，为我尽快地转到科研教学岗位提供了各种便利。感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茅海建院长、方媛书记以及各位同仁，在大家悉心营造的这个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环境里，我过得认真紧张而又开心舒畅。

目 录

致 谢 / 1

自 序 / 1

第一章 掀动底层：政治统合与里弄换颜（1949—1955） / 19

引 言 / 21

一 单位之外：新政权遭遇旧里弄 / 25

二 承续与突进：有效运作的早期居民委员会 / 42

三 国家渗透日常：政治整顿与社会生活计划化 / 63

结语 国家与里弄：未完成的社会重构 / 78

第二章 国家主人翁：第一次普选运动中的底层社会（1953—1954） / 83

引 言 / 85

一 生死攸关：“镇反”思路下的选民资格审查 / 86

二 塑造“主人翁”：树立典型与宣传引领 / 93

三 当选“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 / 107

结语 依然在场的都市与革命 / 126

第三章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的改制与改人（1949—1953） / 133

引 言 / 135

一 扶助与控制：新政权与旧报业 / 137

二 放慢脚步：思想改造运动的时机与目标 / 148

三 由困感到亢进：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 / 155

四 精英急转弯：运动中的徐铸成与严宝礼 / 163

五 体制内外：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 / 180

结语 共产党与上海民间报人 / 187

第四章 约园内外：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1930—1960） / 189

引 言 / 191

一 《西风》：自校园的乍起与沉寂 / 195

二 在疏离与异化之间：大学蜕变中的黄嘉德 / 202

三 华彩写就的悲剧：都市文化尽头的黄嘉音 / 228

结语 圣约翰与上海知识人的日常史 / 257

第五章 时尚再现：隔绝中的大众记忆与想象（1949—1960年代早期） / 263

引 言 / 265

一 国家意志：文化体制的急剧转型与功能转换 / 267

二 时尚不再：别了，好莱坞 / 275

三 影迷重聚：香港影片激起狂热 / 282

四 旁门左道：上海化的西方影像 / 290

五 软性抗衡：党与小市民各自表述 / 300

结语 转型中的延续 / 313

征引文献 / 317

索 引 / 328

附 录 / 339

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 / 341

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 353

近代上海与近代中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 355

论上海里弄 / 366

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 / 391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 397

从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历史和现代教育 / 411

自序

一

我与上海史研究“触电”，始于1980年代末。当时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经黄美真教授推荐，参加了1988年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云集了国内外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大师，也有不少堪称“少壮派”的中青年学者，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蜚声国际学界，他们的著作也已成为大学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会议论文和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令我兴奋不已。那些长期未敢涉足的领域有了开拓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租界问题的再认识；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仅颇受关注，而且呈现出与社会史研究交汇前行的势头；某些“传统”课题，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党派之争等，不再满足于政治事件的铺陈，而是从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去汲取新鲜养料；还有那些过去不受关注的小市民、苏北人等所谓“下只角”里的芸芸大众，也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步入史学殿堂。^① 这些成果不但激发了我对上海史研究的强烈兴趣，更给予我一个具有导引意义的启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摆脱近代史研究规范的束缚，突破“事件—人物”单线叙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过这些崭新的学术成

^① 参见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3、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果，重建问题意识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学术旨趣清晰可见。我有幸赶上了上海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随后三四年内，我开始涉猎上海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目光下移，试图从社会基层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文化范式以及心理反应等要素构成的历史画卷中，去探究社会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去估测上海现代化的深度，并揭示上海现代性之特质。发表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和《论上海里弄》两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浅尝之作。^①《界说》重在上海社会研究的知识与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从历史变迁长时段的一般意义出发，质疑了1949年在上海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是否具有断然界分的意义；《里弄》则粗线条地勾画了近代上海基层生态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演变，论及地方政治和政权更替对里弄组织及其功能转换的影响，将里弄置于一个连续的系统内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时期。虽然我笔下的1949年以后的上海里弄进入了一个与此前似乎断裂的全新时期，这两篇论文所探究的历史延续性问题远还不是自觉的，但跨越1949年的学术旨趣由此而萌发。

在上海史研究迅速升温并成“显学”的1990年代中期，我获得了又一次提升学术的良机。1994—1995年，我到美国上海史研究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与亨利·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项目“社会与文化：20世纪的上海”，以《时空移位：战时上海的保甲制度》一文参加了该项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这篇文章本身的学术成绩现已微不足道，最难得的收获得之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教授在会上的评论和其后两次单独与他的讨论。^②他赞赏《保甲》一文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空中探讨社会控制手段与机制的承续和变化问题，但又告诫说，文中所使用的“传统—现代”“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是值得商

① 两文分别载于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第42—55页；第9辑，第59—7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1993。

② “War Time Shanghai”，Confer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e：20 Century Shanghai，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December 2-3，1994。该论文修改后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为题发表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44—55页。

榷的，任何现成的西方概念都难以容纳现代上海历史的丰富与多样性。^① 他认为，保甲固然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但是它不仅借助了上海沦陷时期的非常状态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复活，而且也是国共两党都寻求的控制都市基层社会的方式。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追究这个制度或组织形态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而在于探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保甲以及居民委员会为何最终都为社会所接纳，不管这种接纳是消极的、无奈的，还是积极的、能动的；为何各个不同的政权对于社会的实际掌控又大不一样。^② 魏斐德教授的意见促使我带着明确的“转型与延续”相统一的问题意识跨入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为“规律”“必然”与政治褒贬所构成的“目的论”或“决定论”史学所左右，也不再让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填充物，而着力去发现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续着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

与此同时，酝酿中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又获得了新的动力。1990年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1958年经济计划与技术官僚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③ 此后，许多学者转向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渐进过程的角度来思考20世纪的中国，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主张重新讨论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

① 讨论会后，魏斐德将他的评论意见写信送给了我。Frederic Wakeman, A Letter to Jishun Zhang, December 22, 1994.

② 魏斐德在他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一书中写到孤岛结束时上海人对日军推行保甲制度的反应：“日本帝国的统治是严厉的。他们使用修改过的保甲制度（该制度完善于其殖民地台湾），它将市民编入相互担保的组织中，置于警察的直接控制之下，一旦发生反抗活动，日本人且其伪政仅使用孤立乃至饥饿来进行惩罚。日军的占领使上海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是，日军的‘新秩序’强加给所有的上海人后，实际上并未发生市民起义和公开对抗。日军得以在1942至1945年期间轻易夺取和统治中国的这一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1937—1941年间给该城造成巨大创伤的各种骚乱”。见此书中译本，芮传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59页。

③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990): 121-141.

下，在美国史学界渐成热门。正如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在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时所指出：“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研究者发现当共产党人开始治理大陆时，出于必要性和策略的考虑，会允许1949年前的组织制度、个人关系与社会模式继续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①

与此同时，国内的上海史研究持续进展。最为令人瞩目的是熊月之先生统领的《上海通史》启动并于1999年出版。^②这部15卷的通史性著作，叙述上起史前时期下至1997年的历史，其中当代部分有4卷，观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虽然其中有关1949—1979年的历史叙述还有一些重要的缺憾，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没有如以往许多同类著作那样，至1949年就就此打住，且当代与民国、晚清也有相当程度的呼应。此著领当代上海史研究之先，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然遗憾的是，这个极好的学术发展契机几乎与我擦肩而过。由于工作的变动，1996年之后的十几年，繁重的校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成了学术圈的“边缘人”。只有在长长的暑假里，才挤出时间到档案馆、图书馆蹲一蹲，找回逐渐远去的做学问的感觉，收获点滴学术心得。我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零打碎敲地起步了。

十余年间时断时续写就的论文，构成了今天写这本小书的基础。《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1950—1960年代早期）》《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转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的考察》以及

① 他们所指的这些代表性著作有 Susan L.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Lü Xiaobo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周杰荣、毕克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引论》，周杰荣、毕克伟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姚昱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第19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是其中的主干。^① 这些文章以“社会与文化”为研究视角，从基层政治动员与文化体制转型两个方面继续讨论国家对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基层社会的反应。比之当初我在“1950年代的上海”入口处窥探之时，这些研究虽然未改初衷，但有了若干进展，其关切点也有所变化。一是从对国家权力的单向度关注，进于国家到达社会基层之间的“中介工具”或中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新闻协会党组）以及社会的“灰色空间”（如里弄、影院）作用的探究。二是从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开始注意到国家强力统合下“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将目光聚焦于新政权的强力控制下近代上海城市特质和都市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力量。

2011年7月，当我卸去学校领导职务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学术领域时，第一个冲动就是实现我的宿愿，写成“1950年代的上海”。接踵而至的一大难题，便是上海史研究已今非昔比。从条件看，档案的继续开放和民间史料的海量发掘以及口述、图像等多种资料的涌现，既使人按捺不住地去探求新的发现，又常常让人感叹无法穷尽而难以下笔。从成果论，尽管有关当代上海史的研究还远不及晚清、民国，但其关注度与日俱增，不仅有相当学术分量的论著面世，还有一大批可畏的“后生”已崭露头角或跃跃欲试。这对一个刚刚回归学术圈的人来说，不能不是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时隔十多年再续“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我既没有资本将原来零星发表的论文简单修改即可汇集成书，更没有理由仅用一些新收集的档案和其他史料做填鸭式的扩充凑够一本书的篇幅，而须在尽力收集新材料并做重新系统解读的基础上，力求对1950年代的上海在史学上命题的意义有新发现，以尽绵薄。

① 依次分别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78—188页，English vers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15, No.4 (Winner 2004): 68-78;《史林》2006年第3期，第1—15页，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 No.1 (Spring 2005): 61-90; 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第30—75页，English vers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35 (April 2010): 52-80;《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第65—74页。

二

打破 1949 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视角观察 1950 年代的中国，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与兴趣所在。这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直接维系着 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学术取向和知识更新。

越来越多的论著以重建 1950 年代中国历史复杂性为旨趣，试图打破“目的论”和“决定论”史学的一统天下，建立起一系列新问题，向单向度叙述的新中国历史提出挑战，聚焦的问题是 1949 年是不是新中国的开端，或者说，新中国的涵义与历史呈现究竟何在。

从上述柯伟林那项开拓性的研究起，“集权主义论”颇具影响力。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端”。如其所说：“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统治之下，国家的控制日益增强，到 1949 年之后，在一种专制主义中达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① 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一种缓慢的、平稳的但也是明确的对于个人与共同体自主性的再度肯定”，^② 也就是所谓“集权主义的顺应力”或现代中国的自由领域问题，但是，集权主义依然在共和国早期的历史研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所言：“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 20 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他所论述的 1950 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则是这个故事中的“最新章节”。^③

① William C. Kirby, Introduction, See William C. Kirby, ed., *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

② William C. Kirby, Introduction, See William C. Kirby ed., *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p. 4. 还可参见 Jean Oi, “Realms of Freedom in Post-Mao China,” See William C. Kirby, ed., pp. 264-284.

③ [美]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第 119 页；“译者序言”，第 22 页。

虽然包括持集权主义看法在内的许多学者并不主张以此为唯一的分析框架，但是，集权主义的观察视角还是为一部分研究者推向极端。这种被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概括为“压迫叙事”的历史书写，^①在毛泽东时代的激烈批评者中甚为流行。他们又回归195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的看法，倾向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②

涉及1950年代中国的“压迫叙事”，目前集中在土改、统购统销、反右、大饥荒等方面的研究，^③似乎与上海史较少直接关联。然而，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叙事框架。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地方性”“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党国”的场域内展开。曾经光怪陆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道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其结果，则从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史学异曲同工，导从一部全能国家的政治史，上海史将不再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有再度沦为国家注脚的危险。

当然，“警惕”并不等于抛弃，集权主义叙事中的国家脉络仍然是研究

- ① Klaus Mühlhahn,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年3月13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的演讲稿，未刊。
- ② 周杰荣、毕克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引论》，周杰荣、毕克伟主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第3页。
- ③ 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杨显惠：《夹边沟记事》，花城出版社，2008；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0（中译本为《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and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45—1957*,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3.

1950年代中国必不可少的路径。否认或低估了国家集权因素显然抛开了国家空前强势这一基本的时代特征，也无法解释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为何如此深刻剧烈，无数个人命运际遇又为何如此起伏跌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叙事路径是近世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尽管现代化叙事十分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或现代化连续进程中的一环，不具有与此前完全断裂、全新开端的意义，但论者充分关注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和探索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政策和不平等的争论、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流动、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联系。现代化叙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画成一个动态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得不就重要的政策达成妥协”。虽然在1950年代中共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大量的必需的经济社会改革，但总的来说，19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领导阶层决心创造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中国的故事，而镇压、暴力、恐怖仅仅是个注脚”，19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①持现代化论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1950—1970年代中国国家在基础医疗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难想象中国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政权必须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来评价。^②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派，他们决心赶上西方。^③

作为近世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现代化叙述对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同是现代化叙事，恰在如何理解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1949年是否标志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问题上，尚存歧见。

① Klaus Mühlhahn,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②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The* (2007): 1–22. 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转引自 Klaus Mühlhahn,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③ Klaus Mühlhahn,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①和叶文心的《上海繁华》^②是都市社会文化研究具有标杆意义的两部著作。尽管两著都着墨于1949年以前的上海现代性，特别是都市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1930年代，但不约而同地将学术旨趣置于跨越时空的现代性叙述。

李欧梵揭示：蕴藏于“老上海风尚”之中的那种“神秘”，“是不曾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尽管它表征着特定时期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但这种“神秘”构成了上海与香港之间互为“她者”的文化关系，并在双城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③叶文心强调：她关切的并不是“上海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个常有争论的问题，而是设问在“上海是否只是上海史上的上海，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在她的叙述里，“上海繁华”这部“平常人的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上海经验并不一定非在上海才能体验”，上海史也不只是表征各种事件发生的“一个地点”，而应该有其“特殊的内涵”。^④

超越时空的现代性叙事为重新建构上海史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其中当然包括重新审视1949年在上海史上的命题意义。由此或可发问，1949年是不是以往官方史书中那个新上海的开端？近世中国到底有过几个新上海？如果说，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与繁华之鼎盛时期，那么，1949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结构下，上海都市现代性及现代化是延续还是被阻断？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李、叶的回答与“延续性”以及“黄金时代”的现代化叙事颇有歧义。两著都认为1949年是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开始，此后的“新上海”或可等同于去摩登与去繁华的脱胎换骨。《上海摩登》的后记论述了195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化在香港的空间内持续发酵，指出上海始终是香港临摹的样板与怀乡的精神家园。甚至到1980年代以后香港不仅代替

① [美]李欧梵(Leo Ou-Tan Lee):《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 [美]叶文心(Wen-hsin Yeh):《上海繁华：都市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王琴、刘润堂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0。

③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346页。

④ [美]叶文心:《上海繁华：都市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第9、14—15页。

而且超越了上海，但老上海仍然成为香港“流行的想象”。而上海本身却在1949—1979年30年间，“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只是从当年租界的某些街区，才能“发觉这个徐娘风韵犹存”，凭着这“一丝余韵”，在那些幸存的旧书和杂志堆中，“重新发现这个当年摩登少妇的风姿”。所谓“上海复兴”则是在中国再次加入世界之后，且30年后这一次的“复兴”，是上海“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① 这似乎在说，只有香港在延续上海摩登的历史并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让上海仿效。《上海繁华》虽然认为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代表“全然的断裂”尚有争议，但也肯定地表述，在共产党政权下，曾经作为城市骄傲的一代繁华沦为上海的“污点与政治包袱”，被一一洗尽。直到1990年代，上海才开始“怀旧”，“平静而又明确地唤起了那些曾被压制和摈弃的革命前的记忆”，中国又回到上海找寻现代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上海成功地追求了全球化的发展，摆脱了革命史观的历史重负。上海不再有大历史，上海脱离了上海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中被划定的地位”。^②

1990年代以后上海史研究大多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转向同步，“摩登”和“繁华”成为上海史研究的主旋律。1949以后的上海史被认为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断裂，充满着革命的大历史，在现代都市的意义上可以忽略。

集权主义、现代化与革命史观三者彼此作用的结果，“革命大叙事”被摈弃，革命史因此一度受到冷落，上海史和城市史研究亦如是作。

但无可否认的是，革命主题从未离开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史是无法回避的叙事路径或方式。所不同的是，“集权主义论”将革命史的红色叙事完全颠覆为黑色的“压迫叙事”，两者关于“革命”的价值取向截然对立；现代化论则从史观角度将革命视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异己力量。然而价值取向和史观的歧义可以挑战“正统”的革命大叙事，但绝无可能“告别”革命史。

暂且撇开“压迫叙事”的价值判断来看现代化叙事的史观，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各种相左的见解，作为一个历史的尺度，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叙

①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345、353页。

② [美]叶文心：《上海繁华：都市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第289—290、292、303页。